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勤勤恳恳，我只赚辛苦钱

扬勤廉正气
创美好生活

节气

江南上巳日，荠菜赛牡丹

□ 本报记者 于锋

今年4月3日是农历三月初三，是一个充满着浪漫诗意的中国传统节日——上巳节。从春秋到今天，上巳节历经几千年演变，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民俗。在上巳节绚烂缤纷的民俗图景背后，洋溢着的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自豪。

古人以天干、地支来纪年、月、日、时。用干支纪日，每十二天就会有一个巳日。一般来说，一个月至少两个巳日，至多三个巳日。第一个巳日，被称为“上巳”。

每个月都有“上巳日”，但作为节日的“上巳节”是特指三月的上巳日。在这个传统节日的演变过程中，三月“上巳”逐渐与三月初三合并为同一个节日。“上巳”的传统民俗也多在三月初三这天进行。

上巳节具体起源于何时，如今已很难说清。至少在西周周公建洛阳城时，就有人们在三月上巳这天在河边设宴庆祝，洗濯身体，聚会游乐的记载。在文献中可看出，上巳节的风俗主要分为褻褻、禊饮、游乐三部分。

所谓“褻褻”，就是在和煦的春日里，到水中或者水边沐浴洗濯，让灾晦不祥之气随流水而逝；所谓“禊饮”，是人们在岸边聚会饮酒，驱走身上寒湿之气。最著名的“上巳节”“褻饮”是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山阴兰亭的那次“褻饮”。风和日丽，曲水流觞，上巳“褻饮”是文人们坚持了千年的风雅；所谓“游乐”，是指到水边游乐。相比端坐喝酒的男子，女子们更热衷于到水滨游乐，从《诗经·郑风》中就能看出有郑国女子春日游玩的风尚。“窈窕淑女美胜艳，妃嫔翡翠明珠”，这是汉代女子已上场的写照。当然，最有趣的“上巳节”游乐是在杜甫的笔下：“三月初三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丽人行》)。“三月初三”也被人们称为“女儿节”。

在江苏各地，三月初三上巳节的风俗多种多样，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三月初三”相当于古人的“春游日”，这一天前后，桃红柳绿，草长莺飞，踏青赏春，正当其时。《南京民俗志》载，早在东晋，南京的上巳节就非常热闹，上至豪门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来到九曲清溪，十里秦淮之滨，取水沐浴，荡涤心胸，追逐嬉闹。《正德江宁县志》载：“(三月初三)携酒游山，城南雨花台最盛，谓之踏青。每日游人晚归如蚁。”学者夏仁虎在《岁华忆语》中描绘了100多年前南京人春游习俗：“人家率于是日(三月初三)携雨花台永安泉品茗，为泉，泉水清冽，足清烦渴，往往谈笑竟日，看夕照而归。”这段文字让人想起《儒林外史》中杜慎卿在雨花台上看到的景象，挑粪桶的小贩相约去永安泉喝茶，去雨花台看落日，于是他发出那句著名的感慨：“真乃菜圃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不差。”

山高水长，江南每一座城市都有三月初三春游的目的地。无锡人在这一天要登惠山、鸿山、斗山、西高山、军嶂山；以“三月初三，西高山；三月初三，军嶂山；三月初三，西高山；三月初三，西高山”的民谣；苏州周边山很多，三月的春游有很多选择。苏州人喜欢春游时看菜花，诗人蔡文《吴郡》中说：“北园看了菜花回，又早春残设饯杯。此日无线醉醇酒，半瓶春色倒玫瑰”。北园、南园分别是苏州阊门内和书院巷两处由名园沦为菜地的遗址，每到三月，开满油菜花，遍地金黄，煞是好看。春游时结伴前往南园、北园看菜花，是苏州文人延续了200多年的雅事。《浮生六记》中，就有沈复夫妇准备了酒菜和茶，雇了馄饨担子(暖酒热菜煮茶)，和三五好友一起前往南园看菜花的趣事，看沈复笔下南园的菜花有多美：“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三月初三，一种看似普通的小花要唱主角，这就是“荠菜花”。“荠菜”谐音“聚财”，一直受到人们喜爱。江南很多地区，以及扬州、南通等地都流传，三月初三是荠菜花的生日。“阳春三月初三，荠菜当良丹”，“三月初三，荠菜花赛牡丹”。对荠菜的热爱，普遍存在于大江南北。旧时南京人踏青时采摘整株的荠菜花，带回来煮鸡蛋吃，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治偏头痛、预防小儿发。据说这“三月初三，荠菜花煮鸡蛋”的习俗，源于三国时的神医华佗。不过，话说回来，荠菜花的确具有明目清火、利肝健胃、清热利尿等功效。记载清代苏州民俗的《清嘉录》中说：苏州人将荠菜花称为“眼亮花”，女子戴了之后，视力更好，也可以将荠菜花与隔年年糕同煎，也有明目的效果，故名之为“眼亮糕”。

古都南京，跨越千载岁月的长江之歌



万里长江从雪域高原奔腾而来，在江苏段放慢了脚步，变得温柔而宏阔。

这是一条滋润百姓、养育万物的生命之江，更是一条文脉绵长、充满灵性的诗意之江。长江流经南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泰州和南通8座城市，大江浩荡，为江苏孕育滋养了金陵文化、淮扬文化、吴文化、江海文化等地域文化，人文鼎盛与江天胜景交相辉映。

今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已落子布局。如何挖掘长江江苏段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弘扬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江苏责无旁贷。

从本期起，本报人文周刊推出“行长江，探文脉”系列报道，寻访我省长江两岸的文脉故事。



□ 本报记者 于锋

南京是长江中下游的历史古都、文化重镇，也是江苏唯一一座跨江发展的城市。“自古以来，南京依江而生，拥江融合，伴江而兴。长江哺育了南京，南京文化也是长江文化的核心文化之一。”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看来，南京城市文化的诞生与演变、南京城市地位的形成和城市气质的成长，都与长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源头来看，南京早期的文化类型是北阴阳营文化、吴越文化和吴越文化，皆为典型的长江文化，毫无疑问，南京的文化基因正是孕育于浩荡长江。

大江东去，奔涌数千年，在275公里的长江南京段两岸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统计，南京地区的长江两岸，共有栖霞山舍利塔、南京城墙、龙船厂遗址等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渡江胜利纪念碑、和记洋行旧址、扬子饭店、下关火车站、天妃宫碑等30多处江苏省级、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的前提下，文化遗存也能“活”起来，他们诉说着长江与这座古城的历史互构与协同发展。

诗意萦绕，“人文名山”记录长江文脉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在长江南岸的栖霞山顶，有一处名为“始皇临江处”的景点。传说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游，最后一次东巡北返时，他在栖霞山脚下的江乘渡口乘舟渡江，远眺大江东去时，发出“巡守之乐，莫过于山海”的慨叹。从那时开始，栖霞山就有了名人足印。此后两千多年时光里，随着一代代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乘兴而来，这座“第一金陵明秀山”(清乾隆帝)累积起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绚丽的人文胜景。佛塔、石窟、碑刻遍布山间。南朝初年，高士明僧绍在几番颠沛流离后，来到紧邻长江的栖霞山隐居讲学。去世后，他所居住的栖霞精舍被改建为栖霞寺。栖霞山因明僧绍而兴，传承至今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有着“江南云冈”之称的千佛崖石窟、唐高宗亲自题额的明征君碑、被梁思成高度评价的南唐舍利塔，印证着栖霞山绵延千年的璀璨文脉。

在南京的长江边，类似于栖霞山的“人文名山”比比皆是，幕府山、燕子矶、乌龙山、狮子山、绣球山、三山矶、雨花台……这些并不算高

的山丘无一例外都是登临望江的好去处，也皆有经典的诗词名篇流传后世。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风……”明洪武年间，诗人高启登上雨花台远望长江，留下传诵千古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如今的雨花台与长江相隔甚远，但在600年前，长江岸线距南京老城区并不遥远，站在雨花台顶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狮子山上的阅江楼始建于明代初年，登楼眺望，奔流向东的江水好似就在脚下流淌。“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宋濂的《阅江楼记》被收入《古文观止》，记录了这座长江名楼的缘起；作为长江三大名矶之一，三面临水、陡峭险峻的燕子矶好比展翅欲飞的燕子，江水在这里展现了激荡奔流的恢弘气势。朱元璋、龚贤、史可法、厉鹗、乾隆等明清人物都在燕子矶挥毫吟诗。“燕子矶分一石砣，长江作杆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钩挂，称我江山有几多。”朱元璋的《燕子矶》如同打油诗，生动地将这位开国之君的豪气展露无遗。镌刻在燕子矶“乾隆御碑”上的《题燕子矶》则是写了四万多首诗的乾隆皇帝不多的佳作之一：“当年闻说绕江瀾，撼地洪涛足下看。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村耕凿久相安。”既写出了长江江岸变迁，也记录下了江边安宁的乡间田园生活。

好似一道绿色的屏风，连绵6000多米的幕府山竖立在南京长江南岸，山崖巍峨，陡峭雄伟。“江山开壮观，风日澹清秋”，面对眼前的如画江山，登顶的明代诗人顾璘曾发出如此赞叹。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弘济寺石刻……幕府山人文胜迹星罗棋布，紧靠长江的地理优势给这里留下了一则则历史佳话。山下的五马渡是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与汝南王、南顿王、彭城王、西阳王等藩王渡江抵达江南之处。传说中，五位皇族分乘五匹马登上江南土地。突然，司马睿的坐骑化作龙飞去。这是一个吉祥的预兆，不久后，司马睿果然登上皇帝，是为晋元帝，他以南京为中心，开创了东晋王朝的百年基业。“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如今的五马渡口竖起一组“化龙胜地”的铸铜雕塑，再现了这个晋更替、衣冠南渡时期的瑰丽传说。幕府山的夹萝峰、达摩洞则见证了佛教高僧达摩与梁武帝的一段掌故。相传达摩从天竺而来，拜见梁武帝，却话不投机。他离开皇宫，过夹萝峰，在达摩洞小憩，又在幕府山下江边折一支芦苇渡江。在江北上岸后，达摩又留下了定山寺、长芦寺等相关遗迹。

拥江达海，南京长江文化蕴含海洋因子

直挂云帆济沧海，长江最终汇入广阔的大海，长江文化也因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海洋文化因子。

南京通达海，早在六朝时期，咸湿的海风就已吹拂到这座古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各国商船溯江而来，停泊在秦淮河口、越城与石头城之间夹江边的良港“石头津”。同样，东晋和南朝也常常派出船队，从石头津出发，南至东南亚、南洋诸国，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进行海外贸易。明代初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迹遍布太平洋和印度洋，28年间航行30多个国家。南京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下西洋船只的重要打造基地，更是郑和船队扬帆远航的出发地。至今，在长江南京段两岸，分布着多处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

走入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三汉河口长江边的郑和宝船遗址公园，眼前的三口长方形池塘看似普通却身份不凡，它们是当年打造郑和宝船的坞式工作间——“作塘”，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江船厂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多次考古中，这片国内目前保存面积最大的船厂遗址上，出土了和古代造船相关的铁锚、舵杆、船板、棕缆、木料等大量文物，充分印证了发生在这里的造船历史。据《明史》记载，郑和船队的船只种类繁多，其中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大致相当于长136.8米、宽55.9米。如此规模宏大的“巨舰”，正是在长江边的船厂一艘艘“诞生”。江面上，分工明确的郑和船队集结完毕，扬帆远航，驶向遥远的蔚蓝海洋。

静海寺和天妃宫建筑群矗立在长江南岸、南京城墙仪凤门之外。从名称就可推测，它们都是和“海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古建筑。明永乐九年(1411)，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平安归来，明成祖朱棣下旨江边建静海寺，以放置郑和从海外带回的奇珍异宝和名贵树种。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李时珍寓居静海寺，考察郑和带回的花草，增补了《本草纲目》中番药、夷果二部。静海寺旁边的天妃宫，则始建于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利回国后。立于此处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至今保存完好，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历史的重要文物，记录了下西洋远航途中大量珍贵的史料，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沧桑巨变，长江两岸记录百年风云

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而鸦片战争则是以《南京条约》(时称《江宁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正是在静海寺签订，在停泊于长江江面上的英国军舰“康华丽”上签订。不止于此，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系列里程碑的事件也发生于长江南京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兴起、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奉安大典、渡江战役胜利等等，在南京江边留下了一系列重要史迹。

南京西站如今已停用多年，其保留至今的建筑由杨廷宝先生设计。和如今的“落寞”不同的是，在100多年前，它是沪宁铁路的西端终点，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火车站之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便是在下关火车站下车进入南京城的。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无数中国军民在长江南京段的江边被日军杀害，至今江滩附近还有上新河、煤炭港、中山码头、燕子矶、地雷营、草鞋峡六处从葬地，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4月23日，三野35军的指战员们渡过长江，解放了古都南京。位于热河路广场的渡江胜利纪念碑落成于1979年4月，远望犹如一艘在长江江面上乘风破浪的战舰，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是江苏唯一一座跨江发展的城市，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在长江对岸修筑浦口新城，但直到1899年南京下关才真正实现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建设和跨江发展得以大提速。在长江两岸，一系列保存至今的交通地标、工业遗址见证了南京城市发展的百年沧桑历史。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隔江对望，下关火车站和浦口火车站遥相呼应，它们彰显了水路和铁路运输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浦口火车站是津浦铁路的南端终点，落成于1914年，是一组保存完整的英式建筑群。这座具有异国风情的车站，记录了朱自清写在散文《背影》中的感人亲情，见证了孙中山灵柩运抵南京，更是今天中国仅存的几座老式火车站之一，成为文艺青年热衷的拍照取景地。而建成于1933年的下关浦口铁路轮渡桥，开通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同样是重要的交通地标，它们代表了百年来铁路、桥梁技术在不同年代的发展成就。

1899年南京下关开埠，江边商埠的码头、马路、银行、饭店、戏院、邮局、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工厂也纷纷建立，为这座城市不断增添活力。如今，在长江南岸，人们能找到扬子饭店、江苏邮政管理局旧址、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旧址、招商局旧址、江南水师学堂旧址、和记洋行旧址、下关电厂旧址、江南水泥厂旧址；在长江北岸，人们能寻访浦镇车辆厂英式建筑、浦口电厂旧址、津浦铁路浦口机务段英式建筑、永利硫酸厂旧址……近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分布于长江南京段两岸，向后人勾勒着这座城市依江而生、拥江融合、伴江而兴的发展轨迹。

先有“苏徐州”，再有“苏东坡”

□ 石艳艳

秦少游诗曰：“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这里的“苏徐州”指的是苏东坡。公元1077—1079年，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两年左右，不仅留下很多德政，还留下了300多篇诗文。公元1082年他才自称东坡，后世也叫他苏东坡居多，而“苏徐州”，是在他自称东坡之前一个最典型的代称。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的开始可谓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苏轼极其果敢冷静地带领徐州百姓成功抵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之后，徐州便修筑了一座“黄楼”，既是取“土能克水”之意，又是对苏轼于危急中挺身而出、无私勇敢地拯救古城社稷的感谢。元丰元年(1078)9月，当黄楼建成之日，苏轼登楼欢饮并作《九日黄楼作》一首。在诗

中，苏轼面对新筑的黄楼充满无限感慨，一面回忆起前年洪水袭城时恐怖的景象以及自己和众人忙于抗洪无暇赏花饮酒的紧张情形；一面表达了自己为刚刚落成的黄楼成为古城新景而异常欢快的兴奋之情。

除了抗洪，苏轼还在元丰元年的春夏之交率领徐州百姓抗击了一场极为严重的旱灾。“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无口生土”，面对严峻的旱情，苏轼忧心忡忡，却又无计可施，率属下去徐州城东的石潭祈雨。许是被苏轼的诚意所感，徐州普降甘霖。在面对同僚道贺时，苏轼不仅没有贪功，反而保持了一贯既往地淡然：“君看大熟岁，风雨占十五。天地本无功，祈禳何足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在密州未能完成和弟弟苏辙团圆的心愿，却意外地在徐州赴任的途中得到了实现。兄弟情深打动了苏辙的前妻张氏，特许苏辙陪苏轼共赴彭城。兄弟二人得以在颍州之别后的第六年共度中秋，喜出望外的苏轼提笔又书写了一篇《水调歌头》，其中有句：“我醉欲对君和，醉须倾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在徐州，苏轼还结交了许多徐州当地的朋友，比如自号云龙山人的张天骥。张天骥是一位才学俱佳却选择避世独立的隐士，对比自己深陷世事、烦恼不断的生活，张山人成为了苏轼笔下理想君子的寄托。著名的《放鹤亭记》便是苏轼在与张天骥交往过程中书写的一篇文章经典。

徐州阶段的苏轼虽然饱受变法派的批评和攻击，却依然对于国事保持着强烈关注。

首先是奖掖后进，提举贤才。苏轼一生都有爱才惜才的美名，这固然是有他早年被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欧阳修等人的提携经历有关，也和北宋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有关。元丰元年苏轼曾在黄楼主办了一场“鹿鸣宴”，这是在乡举试放榜次日宴请主考、执事人员及新举人的仪式。在这场宴席上，苏轼创作了《徐州鹿鸣燕饗诗序》，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选拔的态度。

其次，体恤弱势群体，整饬法令制度。《乞医疗病囚状》作于元丰二年正月，彰显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个性。对于被囚禁的罪犯，寻常人往往是超越之不及，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苏轼却以一种超越常人的境界提出囚犯的医疗救治权。(本文编辑整理自微信公众号“方志江苏”)

名人录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的开始可谓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苏轼极其果敢冷静地带领徐州百姓成功抵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之后，徐州便修筑了一座“黄楼”，既是取“土能克水”之意，又是对苏轼于危急中挺身而出、无私勇敢地拯救古城社稷的感谢。元丰元年(1078)9月，当黄楼建成之日，苏轼登楼欢饮并作《九日黄楼作》一首。在诗

